

论《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思想

李群 傅铮怡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基督教思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 常常能够看到基督教文化的痕迹。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 不仅于内容上有对基督教文化的表现, 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创作上, 仍然能够挖掘《圣经》的创作模式。但是, 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 虽带有对基督教思想的运用和借鉴, 但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认识。

关键词: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基督教 现实生活

中图分类号: I3 **文献标识码:** A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著作中意象的援引、思想的表达以及艺术手法的体现都能够找寻到时代影响的痕迹。在莎士比亚时代, 以知识与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运动, 和以信仰与救赎为特征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在。人们在追求人性解放和自我觉醒的过程中, 自然还受到了基督教伦理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哈姆雷特》中, 不难看到在表达人性意识的觉醒, 人类解放的愿望的同时, 字里行间还充斥着基督教意识。在莎翁的戏剧中常常带有基督教思想的痕迹, 基督教意象的引用和圣经结构, 神秘主义在创作方式上的运用。基督教的影响和宗教内涵已不自觉地融入到了他的思想创作中。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不是基督教戏剧, 更不是基督教思想宣传的工具。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莎士比亚对人性解放和人性光辉的写照冲破了宗教的桎梏,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在戏剧《哈姆雷特》中, 莎翁将人性的终极关注与基督教的信仰连接在了一起, 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作者虽然深受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 但是基督教作为在欧洲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地位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莎士比亚的创作和思想。在戏剧创作时期, 伊丽莎白统治进入晚期, 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詹姆士一世即位后, 资本原始积累积聚, 圈地运动愈演愈烈, 人民生活恶化, 社会风气败坏。在思想上, 由于人文主义运动的倡导和宗教改革的进行, 人们呼吁人的解放, 对人的关注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精神核心, 他们肯定现实的生活, 肯定人的权力, 反对禁欲主义, 求得个性的解放和恣意享受世俗的生活。这一方面解放了人性, 摆脱了人在宗教思想上所受的禁锢, 但是由于人们过度追求欲望的享乐, 人性的脆弱所造成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对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所以莎士比亚在面对现实时, 感受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并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莎士比亚在追求人性解放的同时, 更加深了对人的理解, 他继承和发展了基督教文化思想, 以遏制因人的解放而带来的自我膨胀与人欲泛滥, 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在《哈姆雷特》戏剧的创作中有着深刻的反应。本文亦旨在从意象的援引, 基督教思想文化对人物行动、情节发展的始终贯穿以及作品中对人的终极关怀, 戏剧的写作模式和手法等方面来探讨《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文化。

一、意象的援引

《哈姆雷特》戏剧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 在早期历史中有所记载并进

行过多部文学创作,其中有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马迪克斯于十二世纪末写的《丹麦史》,贝勒福雷编辑的法文版悲剧故事集《历史悲剧》以及另一个遗失剧本《乌尔—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戏剧创作不仅借鉴了上述作品中的故事素材,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基德《西班牙悲剧》的深刻影响,例如场景中点缀的宗教意象,鬼魂的出现以及剧中剧等。但是在《哈姆雷特》戏剧中多处对于圣经意象的提炼和引用都有着莎翁独特的运用和创造。

戏剧《哈姆雷特》故事展开的基础即是哈姆雷特为父复仇,其叔叔克劳迪斯为了权势的欲望毒杀了老国王。在戏剧中,国王的独白说道:“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1]在此处,无疑引用了《圣经》中《创世纪》部分所记载的该隐杀弟的典故,这是人世间的第一个凶案,是从创世纪以来最初的诅咒。而这成为整个戏剧发展的一个基点。

在戏剧之后的发展,哈姆雷特复仇的过程中,圣经意象的应用更是比比皆是。他指责皇后乔特鲁德违背夫妻之爱,钻入乱伦的被襟。“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圣经》中常用夫妻之爱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从此看出,哈姆雷特对母亲乔特鲁德的指责是极其严厉的,认为其辜负了自己伟岸的父亲,而选择了卑鄙的小人。以至于在面对奥菲莉亚时有着相同的态度,他认为女人是柔弱的,是不堪一击的,难以接受痛苦的磨难和现实的考验。“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2]作者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认为女人是柔弱,软弱的,就如水一般。所以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水的意象是复杂的,一方面认为水是柔弱的,一方面又认为水是神圣的,它可以洗涤人们与生俱来的原罪。奥菲莉亚在戏剧中是一个没有心机,追求爱情的美丽女孩儿,作者为她安排在水中自尽不可说没有深意。自杀在基督教会中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这被认为是不相信上帝,收到了魔鬼的蛊惑,而自杀的人更是不允许进入天堂。但是在作品中,作者安排祭司为她祝祷,投入坟中的不是瓦砾与碎石,而是代表处女与贞洁的花圈和散花。可以说作者意图用水来洗清奥菲莉亚身上的罪,在最后终将归于平静。而且水与基督教仪式——洗礼有着密切的联系,洗礼一般意义上为“浸”或“蘸”,是一个洗净罪恶,获得洁净和宁静的仪式,所以奥菲莉亚在水的洗礼下洗净了罪恶,获得了上帝的优待得以重生。与水相对应的意象,便是火。在戏剧中,鬼魂对哈姆雷特说过:“我必须再回到硫磺的烈火里去受煎熬的痛苦”,“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3]基督教中,认为对罪人的惩罚便是要让其在硫磺的烈火中受煎熬,只有经过火焰的灼烧才可以将生前的过失和错误净化。在《圣经》启示文学中所描写的世界末日,最不可少的两样便是水和火,而这两者都有着洗净人们罪恶的象征。这些在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应,例如在艾略特的《荒原》中,第三章“火戒”,便是意图解救人们当今的生活困境,借助于净火的冶炼达到平静。

在戏剧的最后,雷欧提斯受到克劳迪斯阴谋的陷害和蛊惑,在与哈姆雷特的决斗中两败俱伤,哈姆雷特也最终完成了复仇,持毒箭向阴毒的国王刺去,并强迫其喝下早已准备的鸩酒。从这一情节中,能够体验出基督教的思想观念,最直接的就是在基督教教义中不允许人们为恶,面对人们有意的作恶,只有可能自食其果,面对审判。人们终将因自己的恶而跌倒,自食恶果,最终害人害己。戏剧最后雷欧提斯对哈姆雷特说道“这奸恶的诡计已经回转来害了我自己,瞧!我躺在这儿。”^[4]而这话亦可在《圣经》中找到相似话语,在《箴言》中写道“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最后用霍拉旭的嘴说出“你们可以听到.....陷入自害的结局。”“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亦是基督教教义的写照。莎士比亚在最后仍给他笔下的年轻人们一个新的忏

悔机会，雷欧提斯在临死之前实现了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宽恕，请求宽恕的机会，向哈姆雷特请求和解。在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中，大都以宽恕情节作为结尾形式。雷欧提斯最后说道“尊贵的哈姆雷特，让我们互相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和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5]在宽恕的背后更多的是爱和宽容，而前提则是人的认罪与悔改，显然作者没有给克劳狄斯认罪的机会。而宽恕的结局，则是给人以爱的恢复，善的力量的张扬。

二、思想的贯穿

在《哈姆雷特》中基督教意象的运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无论是在人物的对话中，还是事物的借代中，都能在圣经中找到原有的出处和渊源。更进一步的说，在戏剧人物的行动，情节的发展中，基督教思想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透过重重的意象人们始终能够感受到上帝在背后的指引作用，“上帝不但潜在地左右着人物的意念和言行，而且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制约着剧情的嬗变。”^[6]论及西方文学，他们的艺术土壤始终是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无论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莎士比亚在他的思想文化中所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根深蒂固，也必然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现实生活中。

作品始终围绕着哈姆雷特的复仇开展出去，复仇的延宕曾是评论者们一直讨论过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哈姆雷特的犹豫软弱的个性所造就的，有人说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一些列的现实因素所造成的必要的延宕，仅仅从作品表面上来看，哈姆雷特对复仇的踟蹰中却也含有着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基督教的复仇和忏悔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主体的发展脉络。

在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中，他从最初见到鬼魂，由怀疑到相信，再到利用戏剧对克劳狄斯进行试探，装疯来筹划自己的复仇计划。在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中，曾拥有一次绝佳的复仇机会，在克劳狄斯看完哈姆雷特特意找人重新编演老国王被谋杀过程的戏剧之后，陷入了深深地不安，曾跪拜在上帝的面前忏悔，祈求宽恕，当时本可以一剑刺死克劳狄斯的哈姆雷特却选择了放弃。只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认为人在忏悔的时候死去，是可以进入天堂的，哈姆雷特决定在克劳狄斯进行没有任何拯救可能的事情时送他丑恶的灵魂进入地狱。在他和老国王的交流过程中，老哈姆雷特曾经说过自己因为在死之前没有机会进行忏悔，所以在死后只能在地狱收到烈火的煎熬。因为忏悔教义的影响，哈姆雷特错过了复仇的机会，以致在之后的复仇中处处收到限制。

但是哈姆雷特这次放弃复仇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单纯的因为基督教忏悔教义的影响，而是由于无法理清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爱恨之间界限的难以分辨。而这些又是因为哈姆雷特内心情感无法得以有善的宣泄，而对现世的理想又异常的执着。而哈姆雷特的复仇愈加的艰巨和痛苦。梁工在论述哈姆雷特复仇延宕问题时，曾提到，因为在戏剧之中始终缺乏上帝的关照，而上帝的缺席，也使得戏剧始终笼罩在一层灰暗的氛围下，理想终将被现实所扼杀。哈姆雷特的复仇并不仅仅是为了替父报仇，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重组和革新，清除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这是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关照。在对存在和毁灭问题的独白中，他对生存问题的苦苦追寻而不得，表现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类整体的悲悯和关怀的终极价值。而这些都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对爱，对现实的价值标准和理念。

在《哈姆雷特》的最后一章，使人们感受到宿命意识的存在。哈姆雷特的这一转折为他的复仇之路出现了新的转机。他被克劳狄斯送往英国，本是一条必死的路，但是他在无意间拆开了克劳狄斯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件，并且在之后遇到海盗船而死里逃生。这些都使哈姆雷特在戏剧中不断强调是上帝的天意。但是即使在哈姆雷特回国后，仍然没有对克劳狄斯采取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复仇行动。在克劳狄斯安排其与雷欧提斯比剑时，虽知其中有诈，但是哈

姆雷特还是答应了。他说：“一只麻雀，没有天意，也不会随意掉下来。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今天不来，明天总会来；又准备就是一切。”^[7]他明知有阴谋却仍义无反顾，带有基督教的献祭意味。诺斯罗普·弗莱：“悲剧主人公是处于命运之轮顶端的典型代表，即位于地面上人类社会与天堂中更美好的事物之间的中央。”^[8]所以在布拉德雷曾经说过：“没有人在读完它的悲剧把书关上的时候，会感到人是一种可怜而又可卑的生物。他可以是不幸的，也可以是可怕的，但他不是渺小的。他的命运可以是令人心醉的和神秘莫测的，但不是卑鄙无聊的。”哈姆雷特最后用自己的鲜血重建了他心目中的上帝之国，上帝在戏剧之中始终的缺席，他使哈姆雷特依靠自己完成了复仇，但是一定程度上上帝的视角又是始终存在的，在戏剧中，上帝无处不在，上帝的意志决定了一切，而上帝的加入了也无疑增加了剧本的庄重性和崇高性。在对哈姆雷特悲剧人物的描写中，表现了其孤独、焦虑的心理状态，但他始终是作为一个英雄的角色出现的，而这种角色代表的献祭意味，既是牺牲，更是拯救。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始终能够感受到戏剧中的人物在内心深处对“善”的挣扎，即使是克劳狄斯也曾对自己的行为抱有深深的不安和忏悔。戏剧中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终极探索，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总观《哈姆雷特》戏剧，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延宕不仅仅是单纯的为父亲报仇，更有着深层意义上的思考的愿望，在戏剧开头，他是一个开心的王子，他认为人类是万类的灵长，有着杰出的智慧，认为凭借人类的智慧可以创造一切，他认为世界是美好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爱的，都是吸引人的。而所有的这些都在老哈姆雷特国王死后成为烟灭，哈姆雷特开始重新关照这个世界，他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重整乾坤，但终究发现自己力量的淡薄和行动的无力性。戏剧从开始到结束表现了理想国度的坍塌到重建的过程，而这个理想的国度在作者的眼里是充满了善和美好的世界，是有着上帝指引和关照的国度，在这个过程中，哈姆雷特无法避免的有着人类身上难以克服的种种弱点，所以他在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来迎接新的国度的重建。但是在国度的重建中，人们无论是有着怎么样的打算和目的，总是要服从于归善的意识，用实际行动来重建上帝之国。

三、艺术手法上的体现

戏剧不仅是在内容的叙述和思想的表达中融合了基督教的思想，在作品的创作和结构中同样能够找到基督教的痕迹。

圣经故事的叙事模式遵循了“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的这一个结构，弗莱把这种模式称之为U型结构。在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中，主要是表现人类的犯罪及神对世人的拯救。而在罪人的忏悔中，常常用羊来代替人作为赎罪的祭物，在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中，最后也是在神的允许下用羊替代了儿子了儿子的献祭，这也许也是现代“替罪羊”一词的源头。在U型结构中，惩罚到忏悔再到最终的得救这一过程是有着重要的转折作用的，而替罪羊承载着人的罪恶，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之后，随着人的罪恶日益的加深，上帝派他的独子耶稣来到人间，承载着人世间所有的罪恶走上了十字架，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恶，用他的鲜血去洗净世间的污浊。在U型结构中，往往有种人物献祭的体现和展示。吉尔波特·墨雷认为，“悲剧冲突的真正特性是一种从古代宗教的净化和赎罪观念衍生而来的神秘因素。”^[9]而洁净的重要途径就是祭祀。威尔逊·奈特说：“莎士比亚把人类的悲剧主要看作是一场牺牲”，他的悲剧的结尾往往是主人公的牺牲，悲剧英雄总是“死在舞台上，通常还占据着舞台中心位置，架在高处，像放在祭坛上似的。”在《哈姆雷特》的最后，以主人公的死鲜血来洗涤人世间的罪恶，哈姆雷特也恰恰像是拜访在祭祀台上的物品，

承载着人世间所有的罪恶，在他死后，用血洗净世界的不公和黑暗，迎来新秩序的重建。在戏剧中，从美好国度的描述到破坏到重建，其中献祭人物的选择，U型结构有了很好的运用和体现，使戏剧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宗教的庄严意味。但是在戏剧创作中，莎士比亚并不是单纯的引用这样一种U型结构，而是在借鉴中加入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从情节冲突的方面看，《圣经》的叙述模式也成为后世文学中一再出现的原型模式。弗肯在弗莱原型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圣经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冲突都是发生在善恶交锋的基础之上。而圣经文学中故事的展开与人物的塑造都是围绕善恶的交织。在情节冲突方面，多表现在上帝与魔鬼之间，上帝与违逆的人类之间；而在人物方面见，多体现在人性善恶的两端，即上帝的意志和魔鬼的蛊惑。在《哈姆雷特》中，善恶的情节冲突模式贯穿始终，而社会性的冲突只是善恶冲突的外化。正直有理想的哈姆雷特与卑鄙阴毒的克劳狄斯之间的冲突还有哈姆雷特内心激烈的自我冲突都贯穿了整个戏剧始终。

但是，不同于传统的圣经文学，莎士比亚在基督教文学的基础上，融入了自我创作的特点。在莎翁的戏剧中，人物往往都没有绝对的善恶，他认为善恶总是无法具体分割的，二者相互交织，同根同源。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往往呈现了人物内心善恶的挣扎。即使是狠毒的克劳狄斯也会为了自己所犯下的弑兄的罪行而不安忏悔。在《哈姆雷特》戏剧中，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人类在纠结困苦中挣扎向善的过程。

在戏剧细节的描写上，有着“写异象”“说预言”等叙事方式，在戏剧的开头便运用“鬼魂的出现”来引出情节的发展，给戏剧增添了神秘色彩。在人物的对话中，亦常常引用《圣经》中的诗句。在戏剧中，引用了许多带有丰富宗教意义的象征词汇。宗教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运用不仅给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给作品本身赋予了庄严性和崇高性。

《哈姆雷特》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能够见到基督教文化的痕迹，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不仅有意识的运用了基督教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在其中有效融合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认识。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学的起源之初和发展之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学作品本身的发展趋势，以及在文学的发展中各种文化意象原初意义的消融。在基督教文化意象的各种解读中，融合当今社会的现实和价值取向，让文学本身和宗教思想发挥当代的价值和现世意义。

参考文献

- [1][2][3][4][5][7]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雷特》[M].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 [6] 梁工.《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M]. 中华书局. 2007
- [8] 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9] 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述》[M]. 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Christianity in the theory of Hamlet

Li Qun Fu Zhengy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Christianity has influenced westerners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set patterns of living and standards of social value. There is always the christianity appear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number of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 christianity of Hamlet is manifested not only in content, but only artistic form and writing techniques. However, Shakespeare's literary creation, has not only a tendency of the use of christianity, more express his ideas on social problems.

Keywords: Shakespeare Hamlet Christian life

作者简介（可选）：

李 群，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傅铮怡，湖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